



盧建榮主編

歷史與文化叢書17

新文化史

The New Cultural History

編 / 林·亨特

Lynn Hunt

譯 / 江政寬



盧建榮主編

歷史與文化叢書17

新文化史

The New Cultural History

編 / 林·亨特

Lynn Hunt

譯 / 江政寬

The New Cultural History
Copyright © 1989 by The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2 by Rye Field Publications,
A Division of Cité Publishing Ltd.
Translated an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歷史與文化叢書 17

新文化史

The New Cultural History

編者：林·亨特 (Lynn Hunt)
譯者：江政寬
主編：盧建榮
責任編輯：陳毓婷
發行人：涂玉雲
出版：麥田出版
台北市信義路二段213號11樓
電話：02-23517776 傳真：02-23519179
發行：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愛國東路100號1樓
電話：02-23965698 傳真：02-23570954
郵撥帳號：18966004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網址：www.cite.com.tw E-mail：service@cite.com.tw
香港發行所：城邦（香港）出版集團
香港北角英皇道310號雲華大廈4字樓504室
電話：25086231 傳真：25789337
馬新發行所：城邦（馬、新）出版集團 Cite(M) Sdn. Bhd. (458372 U)
11, Jalan 30D/146, Desa Tasik, Sungai Besi,
570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電話：603-9056 3833 傳真：603-9056 2833
E-mail: citekl@cite.com.tw
印刷：凌晨企業有限公司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版北市業字第405號
初版一刷：2002年4月30日

ISBN：986-7895-01-0

版權代理◎博達著作權代理有限公司

Printed in Taiwan

售價：380元
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 編者簡介 ■

林·亨特

1945年出生於巴拿馬，長於美國明尼蘇達州聖保羅市。
1973年獲史丹佛大學博士。曾任教於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
(1974-1987)，以及賓州大學 (U Penn, 1987-1998)，現為加州
大學洛杉磯分校歷史教授 (1998-)，並獲選為2002年美國歷史
學會 (AHA) 會長。專長領域為法國大革命、性別史、文化史
及史學史。

■ 譯者簡介 ■

江政寬

國立成功大學歷史所博士班，美國紐約大學歷史系博士班，現任玄奘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專任講師；專長領域為歐美當代史學史。譯作計有：《法國史學革命：年鑑學派1929-89》（臺北：麥田出版，1997）、《解釋過去／了解現在：歷史社會學》（合譯；臺北：麥田出版，1997）、《後現代歷史學》（臺北：麥田出版，2000），以及《馬丹·蓋赫返鄉記》（臺北：聯經，2000）等書。

獻給

娜塔莉·澤蒙·戴維斯

我們所有人的靈感泉源

目 錄

9	導讀	
	與文學共枕的歷史學	
	歷史不是社會科學的婢女卻是文學的朋友	
	盧建榮	
17	前言	
21	導論	
	歷史、文化與文本	
	林·亨特 (Lynn Hunt)	
	第一部：文化史模式	
51	1 傅柯的文化史	
	派翠西亞·歐布萊恩 (Patricia O'Brien)	
81	2 E. P.湯普森與娜塔莉·澤蒙·戴維斯著作中的群眾、社群與儀式	
	蘇珊·德山 (Suzanne Desan)	
113	3 地方性知識、地方史：紀爾茲與超越紀爾茲	
	雅樂塔·賓爾沙克 (Aletta Biersack)	

4 文學、批評與歷史想像：	
懷特與拉卡頗的文學挑戰	147
羅伊·克拉瑪 (Lloyd S. Kramer)	
第二部：新研究取向	
5 美式的遊行：十九世紀社會各界的再現	189
瑪琳·萊恩 (Mary Ryan)	
6 文本、印刷術、解讀	219
羅歇·夏爾提埃 (Roger Chartier)	
7 身體、細部呈現與人道主義敘事	245
湯瑪斯·拉奎爾 (Thomas W. Laqueur)	
8 文藝復興時期君侯房間的視覺文化	283
蘭道夫·史達恩 (Randolph Starn)	
作者簡介暨作品	319

導讀／盧建榮

與文學共枕的歷史學

歷史不是社會科學的婢女卻是文學的朋友

一、氣勢為創業之母

這是一本行道後進為推尊該行開山祖師的祝賀論文集。打開書扉的次頁寫著：「獻給 娜塔莉·澤蒙·戴維斯：我們所有人的靈感泉源」。而負責編集該書的正是如今聲名如日中天的林·亨特女士。在台灣，戴維斯和亨特兩位女士各自擁有兩本書和一本書的作者頭銜，中文讀者理應對她們不陌生才對，特別是麥田的讀者更應該對她們的治學風格印象深刻。在這兩位女歷史家聯手打造的史學新疆——新文化史——裡餵育多少新進，生產怎麼樣的史學新知？的確是不容關心史學進展的人忽視的問題。亦即對於刻正發展中的新學門，我們除了注意它勇往直前的一面外，還要留心它內部的自我反省。

風行十年之後的新文化史，在掌旗者亨特的安排之下，學門中老少學者共聚一堂，一則凝聚行規共識，一則描繪未來願景。本書的出版正是新學門思調整步伐再出發的會議記錄。它洋溢著昂揚鬥志，也銘刻著工作伙伴的共同誓願。本書問世以來斗轉星移，十二

年過去了，而二年多前該行道第二度每隔十年一次的反省會議記錄也已出版，我們從中窺出反省規模更大，反省的力道也更強。即使如此，新文化史工作者的首度反省記錄還是值得在中文世界廣為流通的必要。首次記錄在反省深度上雖不若第二次記錄般來得發人深省，但每顆稚嫩新手心靈背後那股打造學術王國的氣勢，卻是令人感動莫名！台灣的新文化史界目前正值新栽樹種的時期，深度反省固然需要，但不若有助鼓舞人心的氣勢來得急迫。這是麥田優選第一次反省會議記錄作成中譯本的理由。

二、從文史分流到文史合流

本書分成前後兩部分：前部在講新文化史的學術傳承和資源，後部則屬實證研究的示範。中青學者在此亦有明顯分工。青年學者從事前部的構築，成名的中年學者則貢獻各自心血結晶於後部。當年的青年學者如今早就升任教授，抑且在所屬行道出類拔萃。由於亨特的導論一文，對於前後部的文章構成，有詳細的解說，讀者可以覆按，不必由我多所贅言。我的著力點是為本國讀者提供一個清晰的學術背景，這正是本書欠缺的一個重要環節。該書原本只設想及其西方行道讀者，沒有理由為外國讀者服務，但麥田公司卻要為本國讀者的閱讀權益負責。

上一世紀70年代自從海登·懷特（Hayden White）提出史學與文學有其親緣性的學術構想以來，發揮這一旨趣的後繼者摩肩接踵而至，其中最主要的一位學者非拉卡頗（Dominick LaCapra）莫屬。懷特一直從理論上不斷演繹歷史建構唯有仰賴文學敘述一途這層道理。拉卡頗則屢屢透過小說文本揭示其中文化奧秘。就在這兩

位成名史家一搭一唱之下，不論是文學才調還是文學寫作技巧都成了講究歷史書寫學者格外重視的所在。這有點中文世界「文史不分」的況味。如所周知，過去要求一位史家要具備史遷之才的才，指的是文學才華，而不是史學才華。這不就與懷特論旨有所暗合了嗎？所不同地，關於傳統中國「文史不分」的提法，中國文士視為理所當然，沒有人去管它所以然。懷特則大張旗鼓去追求其中所以然。等到上一世紀的史家在引進西方史學的同時，為建立史學設科的合法性，乃朝著文史分途發展的方向規畫。再加上，史家以去文學性的手段來達成史學設科的目標。就這樣，文史分手而漸行漸遠。如今，我們經由懷特有重新檢討文史合流倡議的必要。

三、兩大史學前浪殊途同歸於敘述史學

新文化史家一致推崇的先行者有兩位，即E. P. 湯普森（E. P. Thompson）和戴維斯。兩人的著作都以講故事的方式呈現他們所發現的歷史大道理。這證諸麥田出版的兩人作品，不論是《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還是《檔案中的虛構》（*Fiction in the Archives: Pardon Tales and Their Tellers in Sixteenth-Century*），當知我此處所言不虛。這就是說，兩人的史學作品風格強烈透露出「敘述史學」的寫作傾向。戴維斯不僅誠實告訴讀者其受到懷特的啟發，而且也不掩她對懷特的敬意。至於湯普森在歷史書寫上廢棄主流「分析史學」的寫作格式，倒是與懷特揭示的宗旨無關。他是位民間學者，他寫作是為平民而非學界菁英，他自然要考慮平民讀者的理解能力。這麼一來，湯普森所為亦與日後懷特構想不謀而合。要之，新文化史的兩大「前浪」，從不同發

聲位置都匯聚成一股支持懷特的計畫：歷史向文學靠攏。史學界中心胸狹隘者視懷特為叛徒，即是著眼於懷特有取悅文學批評家的後果而發的。他們敵視懷特，是打從心底無法認同史學向文學稱臣的表示。

四、人類學亦不自外於敘述文化

從事新文化史工作的學者在選擇學科盟友上，他們會優選文學批評和人類學這兩種學科。史學受益於文學批評從拉卡頗身上益發證明，毋庸贅論。此處集中講人類學。晚近人類學的發展在方法論和認知論上有往民族誌製作聚焦的趨勢。而民族誌製作涉及敘述，這就把人類學拉往文學文化。講難聽一點，人類學也向文學靠攏。當今最活躍的四位人類學家，即克利福·紀爾茲（Clifford Geertz）、馬歇爾·沙林斯（Marshall Sahlins）、以及柯瑪羅夫夫婦（Tohn & Jean Comaroffs）等，都大力提倡民族誌的製作必須考慮敘述的文學文化因素。

民族誌之於人類學家就像史料之於歷史學家一般重要。民族誌和史料都是學者立論的根基，所不同地，民族誌出於學者根據活人社會的製作，而史料則是過去社會中人活動的遺跡或遺物。所以就知識生產角度而論，人類學者從民族誌到作品的寫出，是雙重人爲操作，而歷史學者只有作品一重人爲操作。這並不是說，人類學者比歷史學者多了一重人爲操作，學科的主觀性就強過一籌，而是人類學面對的是活人世界，歷史學探究的是死人世界，活人可以查證，死人則對史家的說辭無從置喙。就此而言，歷史學的主觀性可是無與倫比。且撇開學科主觀性不談，人類學者從事民族誌書寫就

如同歷史學者做的是歷史書寫的工作一樣，勢必走敘述的路線不可。而敘述的理論及其潛藏的創意發展，都是文學中所共同開發出的文化。歷史學家也罷，人類學家也好，在文學敘述香味的席捲之下，少有不「聞香下馬」的。

以上我們從懷特、拉卡頗、湯普森、戴維斯等一眾老牌歷史家一路談下來，到紀爾茲、沙林斯、以及柯瑪羅夫夫婦等四位人類學家，無非在指出，在作品的表述功夫上無人可以自外於文學敘述的藩籬。在這裡，歷史學和人類學是沒有兩樣的。有了這個共同的學科家族基因，文學、歷史學、以及人類學合組的「人文學科」這個大家庭，其實在治學共識上比起過往只有加強而不削弱。然則，本書在新文化史學術傳承上首標傅柯（Michel Foucault）又是何等意義呢？傅柯對於傳統歷史學流於瑣碎以及思想貧弱大表反感，他在寫作上大破大立，的確予歷史書寫面目一新。歷史家如不建構歷史也就罷了，如要建構，這裡面表述的空間何其浩渺，潛藏無窮的生機，就等待下一位傅柯來示範了。就此而論，傅柯生前在敘述創新的成就上可說令人低迴不已。

五、終結史學淪為社會科學婢女的時代

上個世紀60、70年代，許多歷史學者視社會學科為歷史學的盟友，提倡援引社會科學理論以治史。幾十年過去了，在這一思潮鼓盪之下，成功者少，「畫虎不成反類犬者」多。援引社會科學理論以治史者，多集中在政治史和經濟史。如今經濟史風潮已走入谷底不說，而政治史又有故步自封的污名，這兩種學門可以說均處在後繼乏力的邊緣。而就在這個同時，政治學者反而爭相成為政治史

學者。這究竟是史學的生機還是危機，言人人殊。援引他學理論以爲奧援的研究策略本身並沒有錯，錯的是研究者「入主出奴」的心態。倘若史家的發現只是某特定社會科學理論的注腳，等而下之或是套公式找證據的史作，這就使歷史學淪爲社會科學的婢女。處此情境，歷史學還有何主體性和自立性可言？

六、新文化史第二個十年成果豐碩

亨特在青壯之齡（四十四歲）集結同行之力出版了這本加速新文化史研究議程的書，從事後往前看，證明她是饒富前瞻性的學術舵手。敘述性文化史作品在近十年質量上續有發展。亨特本人《法國大革命時期的家庭羅曼史》（*The Family Romanc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便是這類作品中的翹楚。本書作者之一的羅歇·夏爾提埃（Roger Chartier）事後也有新作：《法國大革命的文化根源》（*The Cultural Origins of the France Revolution* [Durham: Duke Univ. Press, 1991]）在敘述手法上同樣令人一新耳目。夏爾提埃被喻爲年鑑學派繼布勞岱之後另一個高峰。美國史家西蒙·夏瑪（Simon Schama）於其最新著作中安插一位虛構人物，其敘述手法之大膽和創新，更令其同儕瞠目結舌。然而，史家再怎麼運用敘述筆法，其所運用者都只佔文學敘述文化中的九牛一毛，更遑論史家操弄敘述手法也不敢與文學最新敘述技藝取得同步發展。史著經營的成敗不在於它是否「屈從」於文學文化，而在於它本身是否發光發熱。一本發光發熱的敘述史作在價值上等同於一顆文學創作的璀璨明珠。你還猶豫什麼？

盧建榮 完稿於3/26/2002 師大歷史系圖書館

盧建榮

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州立大學歷史系博士，現爲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副研究員、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系暨文化大學歷史研究所兼任教授，是國內新文化研究的倡導者兼作手，這方面著作計有專書一本：《分裂的國族認同，1975-1997》（臺北：麥田出版，1999）、論文十七篇、相關介紹十餘篇。

前言

這本書的原始構想形成於「法國史：文本與文化」(French History: Texts and Culture)學術會議，該會議在1987年4月11日舉辦於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而那年的春季學期正逢羅歇·夏爾提埃(Roger Chartier)到柏克萊作為期一個月的訪問。儘管此一方案最後擴大為包括其他國別之歷史領域的作品，不過，本書的所有撰稿者皆出席了原先的那場會議，而且在協助我們找尋有關文化史的共同主題和了解時，那一集體經驗是決定性的。此一學術會議由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法國研究計畫所組織，經費由古爾德基金會(Florence J. Gould Foundation)和盧爾西慈善暨教育信託(Georges Lurcy Charitable and Educational Trust)所支助。我們極為感激這兩個基金會和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使得此一聚會——心靈的聚會——成為可能。我們也要感謝充分擔當評論者角色的娜塔莉·澤蒙·戴維斯(Natalie Zemon Davis)，還有眾多參與此一會議的其他法國史學者以及其他歷史領域的學者。



新文化史

The New Cultural History

導論

歷史、文化與文本

林·亨特

卡耳（E. H. Carr）於1961年時聲稱：「歷史學愈注意社會學，社會學愈注意歷史學，則對兩者愈有利。」¹ 在那時，這一聲稱基本上是針對卡耳的歷史學同僚——尤其是那些英國歷史學家——的喊殺聲，不論是否情願，卡耳希望他們前進到社會取向之歷史學的新世紀。從回顧的角度觀看，卡耳似乎是相當正確的：這兩個領域的優勢都是社會—歷史取向的。歷史社會學已變成社會學最重要的次級領域之一，或許，還是成長最快速的次級領域；同時，社會史也已壓倒政治史成為歷史研究最重要的領域（1958至78年之間，美國的博士論文裡社會史的數量勝過政治史四倍，即可說明這一事實。）²

¹ Edward Hallett Carr, *What Is History?* (New York, 1965; first published 1961), p. 84; 譯註：中譯本參見王任光譯，《歷史論集》（臺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68）。

² Robert Darnton, "Intellectual and Cultural History," in *The Past Before Us: Contemporary Historical Writ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ed. Michael Kammen (Ithaca, N.Y., 1980), p. 334.

在歷史學之中，兩種位居支配地位的解釋典範助長了社會史的趨勢：一是馬克思主義，另一則是「年鑑」學派。儘管於1950和60年代，馬克思主義一點兒也不新穎，然而，在提升歷史學家對社會史興趣的那種闡釋模式裡，新的潮流卻出足了風頭。1950年代末期和1960年代初期，一群較年輕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開始出版討論「民眾史」(history from below)的書籍和論文，包括喬治·呂德(George Rudé)討論巴黎群眾，阿貝爾·索布爾(Albert Soboul)討論巴黎基進革命黨人，以及湯普森(E. P. Thompson)討論英國工人階級，如今已成經典性的研究。³由於這一鼓舞，1960和70年代的歷史學家，從政治領袖和政治制度這些更傳統的歷史，轉向探究工人、僕人、婦女、族群等等的社會成分和日常生活。

年鑑學派的影響較為晚近，然卻表現得極為搶眼。最初名為《經濟與社會史年鑑》(*Annales d'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的這份學報，於1929年由馬克·布洛克(Marc Bloch)和呂西安·費夫賀(Lucien Febvre)所創立。它於1930年代從史特拉斯堡(Strasbourg)遷移至巴黎，於1946年更改成其通行名稱：《年鑑：經濟／社會／文化》(*Annales: Economies, Sociétés, Civilisation*)。二次大戰後在制度上成為高等實踐研究院第六部的一部分，才變成——或者說，至少才堪稱——一個學派。1950和60年代，由於費爾南·布勞岱(Fernand Braudel)既職掌第六部，同時又主持《年鑑》，使得年鑑

³ George Rudé, *The Crowd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Oxford, 1959); Albert Soboul, *Les Sans-culottes parisiens en l'an II*, 2d ed. (Paris, 1962); E. P. Thompson,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London, 1963); 譯註：中譯本參見賈士衡譯，《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臺北：麥田出版，2001)。

學派具有同一感和連續感。⁴到了1970年代，這一學派的聲望已是國際性的；1979年《歷史研究國際手冊》(*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Historical Studies*)所收錄的關於年鑑學派的索引入門，遠遠超過——除了馬克思與馬克思主義之外的——任何其他的主題。⁵

然而，是否真有如崔伊恩·史托伊恩諾維奇(Traian Stoianovich)在其著作書名中所堅稱的年鑑「典範」呢？他聲稱，年鑑學派強調的系列、功能和結構的研究取向，將社會理解成一個整體的、整合的有機體。「年鑑典範構成了這樣的一種探究，亦即從時間、空間、人文、社會、經濟、文化和環境的複合面相，來探究一種社會體系如何運作，或者說，一種總體的特徵如何運作。」⁶這一定義幾乎沒有遺漏什麼；結果便是，在該定義所假定的「整體歷史」(total history)傾向中，年鑑典範喪失了所有的獨特性。

二次大戰之後的幾十年裡，年鑑學派的中樞人物布勞岱，在他討論地中海的作品中構思了一種更加清晰的模式。他假定了對應於三種不同時間單位的三個分析層次：地理環境支配的結構或長時期(longue durée)；適用於社會生活的局勢或中時期；以及包括政治

⁴ 有關年鑑學派的歷史，參見Stoianovich, *French Historical Method: The Annales Paradigm* (Ithaca, N.Y., 1976)；以及Guy Bourdieu and Hervé Martin, *Les Ecoles historiques* (Paris, 1983)。譯註：另可參考Peter Burke著，江政寬譯，《法國史學革命：年鑑學派 1929-89》(臺北：麥田出版，1997)。

⁵ Georg G. Iggers and Harold T. Parker, eds,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Historical Studies* (Westport, Conn., 1979)；譯註：中譯本參見陳海宏等譯，《歷史研究國際手冊》(北京：華夏出版社，1989)。

⁶ Stoianovich, *French Historical Method*, p. 236.

和關於個人所有一切的轉瞬即逝的「事件」。結構或長時期具有優先性，而事件則被比擬成海面上的騷動和泡沫。⁷

儘管布勞岱本身是有巨大影響力的（至少在某個程度上由於其學術地位的鞏固，）然而，他的範例並未帶給明確的比較研究太多的啓示。相反地，年鑑第三代的法國歷史學家——諸如埃曼紐·勒華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和皮耶·古貝赫（Pierre Goubert）等人——則創立了一種整體區域史的替代模式，其並非關注世界性的經濟區域，而是關注法國境內的區域。經濟與社會史支配了他們的研究；長時期當然仍有其作用，但地理面相——雖說仍舊出現——在每一研究的肇端，似乎只是作為一種公式，而非精神指引。這一歷史解釋的模式，基本上與布勞岱的模式類似：除了經濟趨勢之外，長時期受到氣候、生物學和人口統計學之支配；更清楚從屬於（常以十、二十或者甚至五十年為單位來界定的）局勢波動的社會關係，構成了歷史實在的第二層次；而政治、文化與智識生活構成了歷史經驗第三層的、更加從屬的層次。第一與第二層次之間的互動則被假定為首要的。

年鑑對經濟與社會史的強調，不久甚至也散布到更傳統的歷史學報。到了1972年，在相當守舊的《歷史評論》（*Revue historique*）裡，經濟與社會史取代了傳記和宗教史，成為政治史之後的最大範

⁷ Fernand Braudel, *La Méditerranée et le monde méditerranéen à l'époque de Philippe II* (Paris, 1949); 英譯本 (London, 1972-1973); 譯註：中譯本參見唐家龍、曾培耿等譯，《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

疇。⁸ 1965至84年之間，美國的《法國史研究》（*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學報裡，經濟與社會史之論文的數量幾乎倍增（從24%升至46%）。⁹ 儘管我只審慎地察閱了法國史的學報，然而，我猜想，大部分的知識領域也可以發現同樣的趨勢。卡耳不是年鑑派歷史學家，但是，他的話卻可恰當地表達出年鑑學派的地位：「既然，熱衷於經濟與社會方面的研究，比熱衷於憲法和政治方面的研究，更能呈現人類發展上的一個更廣泛、更前進的階段，那麼經濟與社會的歷史解釋，或可說比起僅局限於政治的歷史解釋，還能呈現歷史上更前進的階段。」¹⁰

然而，近年來社會史崛起之主要推手的這類解釋模式，歷經了強調上的重大移轉，就像馬克思主義者和年鑑歷史學家那樣，遞次增加了對於文化史的興趣。在馬克思主義取向的歷史學裡，這一文化的轉向已呈現在湯普森討論英國工人階級的作品。湯普森明白地摒棄下層／上層建築的隱喻，致力於研究他所謂的「文化與道德的調節」——「亦即，在文化方面……處理這些物質經驗的方式。」¹¹

⁸ Alain Corbin, "La Revue historique. Analyse du contenu d'une publication rivale des Annales," in *Au Berceau des Annales: Le Milieu strasbourgeois, l'histoire en France au début du XXe siècle*, ed. Charles-Olivier Carbonell and Georges Livet (Toulouse, 1979), p. 136.

⁹ 我的數據取自 Lynn Hunt, "French History in the Last Twenty Year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Annales Paradigm,"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21 (1986): 209-224。

¹⁰ Carr, *What Is History?* pp. 164-165.

¹¹ 引自 Ellen Kay Trimberger, "E. P. Thompson: Understanding the Process of History," in *Vision and Method in Historical Sociology*, ed. Theda Skocpol (Cambridge, 1984), p. 219。

他在《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裡(頁10),將階級意識描述成:「這些〔生產關係〕經驗的文化表述:體現在傳統、價值體系、觀念,以及制度形式當中。」該書在馬克思主義者之間——很多人指控湯普森帶有自由意志論和觀念論的偏見——挑起了極大的爭議,不過在較年輕的歷史學家之間,其仍有相當大的權威性。¹²

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朝文化的轉向,最明顯的例子莫過於他們逐增的語言興趣。1980年《歷史研究研習會》(*History Workshop*)的編輯,在題為「語言與歷史」的刊物社論中承認其稱之為「結構語言學」(一個誤用的術語,但顯示語言興趣之影響)的逐增影響力。他們爭辯道,對語言的注意能夠藉由以「語言的『符號』功能」為重點,來挑戰「知識的反觀理論」,並影響「社會主義歷史學家」的實作。¹³在法國史的研究中,威廉·余威爾(William Sewell)討論法國工人階級之勞動語言的著作,是這一興趣下最著名的產物。¹⁴

他們雖則都注意到了「上層建築」的作用,然而,大多數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也不過是調整了一下馬克思主義歷史解釋的基礎模式。如同湯普森所云,「階級經驗大部分由人們生存的——或者說,不知不覺進入的——生產關係所決定。」¹⁵在一本討論歷史學

¹² Trimberger在前揭文中,回顧了許多有關湯普森的批評。

¹³ *History Workshop* 10 (1980): 1-5; 引自頁1。

¹⁴ William H. Sewell, Jr., *Work and Revolution in France: The Language of Labor from the Old Regime to 1848* (Cambridge, 1980).

¹⁵ Thompson,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p. 10. 連余威爾的「革命辯證」(dialectic of revolution)——雖說它強調啟蒙思想中的種種矛盾所扮演

與語言學、自覺為馬克思主義的著作裡,雷吉娜·羅班(Régine Robin)聲稱,唯有參考一種「語言之外的」經驗層次,亦即生產的社會關係的經驗,階級意識才能被政治論述構成。¹⁶此外,在馬克思主義的模式裡,社會經驗在定義上一直是居於首位的。

有關馬克思主義的文化興趣的特徵,有一個值得注意的例外,或可證明這一通例。在他開闢新路徑的論文集《階級的語言》(*Languages of Class*)裡,葛瑞斯·瓊斯(Gareth Stedman Jones)試圖與馬克思主義研究取向的不適當處格鬥。在討論股市製圖者的階級語言時,他觀察到:「還質疑得不夠之處在於,是否這種語言只能從某一特定階級,或社會、職業團體的語言加以表述,或者說,只能從相應性的角度加以分析。」同樣地,湯普森也認定,「『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之間,有一種相對上的直接關係,其幾乎不留給意識形態脈絡任何的空間,因在其中特定階級語言的連貫性可被重新建構,」而瓊斯則批判這一說法。然而,藉由表明基進主義意識形態傳統、變遷特質與國家政策的重要性,瓊斯實際上偏離了馬克思主義的分析。如同他在導論裡堅稱:「既然正是政治語言的

的角色——也保留了一種基本的馬克思主義架構:在法國大革命不同年代的勞工組織與政治鬥爭之中的變化的衝擊下,工人的意識向前邁進了。對余威爾的立場所作的批判,參見Lynn Hunt and George Sheridan, "Corporatism, Association, and the Language of Labor in France, 1750-1850,"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58 (1986): 813-44.

¹⁶ 有關羅班的立場以及其他探討法國大革命之語言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的立場,相關的討論參見Lynn Hunt, *Politics, Culture, and Class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1984), p. 22.

論述結構，首先構思且定義了利益，我們因此不能把政治語言解碼為達成利益之最初與物質的表述。」¹⁷ 這一馬克思主義議程的徹底置換，還可以看成是馬克思主義嗎？

年鑑學派裡對於舊模式的挑戰格外引人注目。儘管經濟史、社會史和人口統計史在年鑑學派本身仍佔支配地位（1965至84年間超過半數是這類的論文，便可說明這一點，）然而，思想與文化史則強有力地緊隨其後（其論文數量約佔35%，而政治史則有11-14%。）¹⁸ 當年鑑學派歷史學家第四代逐漸專注於法國人相當令人費解地稱為「心態」（mentalités）之事務的時候，經濟與社會史在重要性上便降低了。¹⁹ 對於心態的濃厚興趣（甚至連年鑑學派較早的世代亦然，）同樣又導致了對於年鑑典範的新挑戰。

第四代年鑑歷史學家，諸如羅歇·夏爾提埃和雅克·雷凡爾（Jacques Revel）等人，反對將心態之特徵描述為所謂第三層次歷史經驗的一部分。對他們來說，第三層次一點兒也不是一種層次，而是一種歷史實在的基本決定因素。如同夏爾提埃所聲稱，「以此方式創立的關係，並非心態結構在它們的物質決定因素上的一種依賴。社會世界本身的再現是社會實在的要素。」²⁰ 經濟與社會關係

¹⁷ Gareth Stedman Jones, *Languages of Class: Studies in English Working Class History, 1832-1982* (Cambridge, 1983), pp. 94, 101, and 22.

¹⁸ Hunt, "The Last Twenty Years," table 1.

¹⁹ Volker Sellin在 "Mentalität und Mentalitätsgeschichte," *Historische Zeitschrift* 241 (1985): 555-598之中，追溯了該詞、該概念的歷史。

²⁰ Roger Chartier, "Intellectual History or Sociocultural History? The French Trajectories," in *Modern European Intellectual History: Reappraisals and New*

未優先於文化關係，或者說，未決定文化關係；它們本身是文化實踐和文化生產的領域——它們無法藉由參考一種文化之外的經驗面相來加以演繹地解釋。²¹

相反地，就文化實踐的探究而言，米歇·傅柯（Michel Foucault）對社會史的基本預設之批評，一直影響著諸如夏爾提埃和雷凡爾等年鑑歷史學家。傅柯表明了沒有「渾然天成的」思想客體，如同夏爾提埃的解釋那般，「每一時代的一般概念各有其內容，由此角度觀之，瘋狂、醫療和國家並不是可以概念化的範疇；」²² 它們在歷史層面上被賦予成「論述客體」，而且，既然它們以歷史作為其立足點，在意涵上亦不斷變遷，那麼它們就無法提供給史學方法一種超驗的或普遍的基礎。

第一代和第二代年鑑歷史學家甚至跟傅柯之間也存在著某些類似性；這些學者都找尋支配集體實踐的無名規則，也都參與了置換歷史裡的獨特「主體」。然而，傅柯與第一代年鑑歷史學家不同，他基本上是個反實證主義者。他不相信，在探究人的性質時能夠將社會科學統合起來，正因為他否認「人」這一概念和社會科學裡方法的可能性，也難怪，若干評論者稱他的「系譜學」為一種「反方

Perspectives, ed. Dominick LaCapra and Steven L. Kaplan (Ithaca, N.Y., 1982), p. 30.

²¹ 一如傅柯在其討論論述的作品中所解釋的，他有興趣的不在於動搖論述結構「隱藏的」（underlying）基礎，而是在於從「歷史層面」了解「真理效應（truth-effects）怎樣自本身既非真、亦非偽的論述之中產生。」（徵引自 Mark Poster, "Foucault and History," *Social Research* 49 [1982]: 116-142；引自頁128）。

²² Chartier, "Intellectual History," p. 43.

法」(antimenthod)。²³

儘管傅柯的銳利批評一直引起歷史學家的興趣，然而，他們並未採納他的方法——或者說，反方法——來作為他們實作的模式。傅柯不願提出因果分析，也否認論述結構與其社會—政治脈絡之間——例如，看待瘋狂之觀點的變遷與17和18世紀的社會和政治變遷之間——的任何演繹關係具備有效性。他竭力駁斥有關起源的研究，而他的「系譜學」則不需任何經濟、社會或政治上的一般基礎。於是，他對特定機構與論述類型之運作的局部洞察力，雖產生了相當多的研究（大部分致力於修正傅柯常是粗疏的建構，）然而，他大體上的議程仍保持獨特的原狀。傅柯將他那種版本的歷史，描述為「擾亂先前被視為不流動的事物；……零碎化被認為合成一體的事物；……表明被想像成本身具一致性之事物的異質性」的一種歷史，而且他也聲稱，「我相當清楚地察覺到，我只是在寫作虛構事物，」這時候除此之外它還能如何呢？他更明白地指陳，

²³ 有關傅柯之方法的一個有用的討論，參見Larry Shiner, "Reading Foucault: Anti-Method and the Genealogy of Power-knowledge," *History and Theory* 21 (1982): 382-397；以及Hubert L. Dreyfus and Paul Rabinow, *Michel Foucault: Beyond Structuralism and Hermeneutics* (Chicago, 1982)；譯註：中譯本參見錢俊譯，《傅柯——超越結構主義與詮釋學》（臺北：桂冠圖書公司，1992）。年鑑學派與「結構主義」之間的差異，參見Stuart Clark, "The Annales Historians," in *The Return of Grand Theory in the Human Sciences*, ed. Quentin Skinner (Cambridge, 1985), pp. 177-198的討論。克拉克（Clark）觀察到，「布勞岱的結構史學與年鑑學派，受惠於其敵視的任何形式的現象學之處，遠勝過其先行的結構主義。」（頁195）布勞岱的決定論偏好一種有關經驗的自然敘述而非文化敘述。（頁192）

「我不想繞一大圈只是為了說那種虛構事物超越了真理（hors vérité）。對我而言，讓虛構事物在真理中運作似乎是可能的。」²⁴然而，他不曾詳加敘述他怎樣確定這一「真理」，或者它的知識論地位會是什麼。

縱使傅柯在馬克思主義與年鑑學派之外，或許未全然成功地開拓出通過文化史畛域的第三條道路，然而，他對這個領域的概念化之影響，不可否認一直是極為驚人的。在本書第一章〈傅柯的文化史〉一文裡，派翠西亞·歐布萊恩（Patricia O'Brien）檢視了傅柯的影響力，以及他作為一位文化史家的實作。她有說服力地爭辯說，傅柯在策略上將文化設置於論述裡，通過權力技術的稜鏡來研究文化。他並非嘗試要追溯權力對於國家、立法過程或階級鬥爭的作用；相反地，他在「最不起眼之處」——在情感、愛情、善惡觀念的操作中，也在監獄設計圖和醫生的觀察中，以及在諸如生物學和語言學這類學科影響深遠的變遷中——找尋它們。

那麼，有關這種「新文化史」其議程為何呢？如同傅柯的研究一般，這種廣泛的心態史一直被批評為缺乏清晰焦點。法蘭索瓦·弗黑（François Furet）指摘這種定義的缺乏，助長了一種「對新議題無止境地追索，」因新議題只受新風尚的支配。²⁵類似地，羅伯特·達爾頓（Robert Darnton）也指控說，「儘管大量充斥著討論

²⁴ 徵引自Allan Megill, *Prophets of Extremity: Nietzsche, Heidegger, Foucault, Derrida*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1985), pp. 235, 234.

²⁵ François Furet, "Beyond the Annales,"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55 (1983): 389-410；引自頁405。